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与东部地带的 经济发展:1995~2000

王桂新 黄颖钰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考察了 1995~2000 年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与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关系,发现省际迁移人口(外来劳动力)已成为推动东部地带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重要因素。正是大量外来劳动力的迁入,弥补了东部地带本地劳动力供给的不足,推动东部地带的 GDP 增长了 10% 以上,对东部地带 GDP 增长的贡献度几乎达 15%。而且在东部地带,越是省际人口迁移吸引中心,迁入人口规模越大,迁入的外来劳动力对推动迁入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和贡献就越大。

关键词: 东部地带;人口迁移;经济发展;贡献度

【作者简介】 王桂新,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黄颖钰,上海市浦东新区税务局。上海:200000

1 引言

中国通常主要根据自然环境条件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差异,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东部地带(亦称东部沿海地区)自然环境条件优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历来对全国社会经济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中央政府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时所划分的三大地带,东部地带国土面积约占全国 11.07%,而国民生产总值(GDP)却占全国一半以上,并且该比重仍呈上升趋势。1995 年,东部地带的 GDP 约占全国的 55.64%,2000 年这一比重进一步上升到 57.29%。而且在此期间,东部地带的 GDP 增长率达 73.98%(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带),增长量几乎占全国同期增长量的 60%(59.68%)。因此,考察省际人口迁移与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关系及作用,对探讨东部地带经济发展动因及其未来发展的持续性都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主要决定于资本和劳动力两大要素。虽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技术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但作为最基本生产要素的劳动力,无论何时都应该是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之一。中国东部地带的经济发展,也同样应该符合这一基本经济规律。但是,根据国家统计部门发表的常规统计年鉴数据计算,1995 年东部地带从业人数为 24005.29 万人,约占全国从业人数的 38.5%;到 2000 年则减少为 23886.95 万人,占全国从业人员的比重也相应下降到 37.8%。而同期全国从业人数却呈增长趋势。可见,在此期间,东部地带从业人数的减少与其经济的快速增长趋势相背,东部地带的经济增长与从业劳动力的关系,似乎不支持以上结论。虽然,可以认为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高及体制改革或制度创新等因素,已开始对东部地带的经济增长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劳动力要素是否已无关紧要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要考察一下在此期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流向、流量分布,就不难发现其答案所在。因为到目前为止,政府各级统计部门正式发表、常规统计的从

业劳动力数据,基本都是指在本地拥有户籍的所谓本地劳动力,而大量流入东部地带、尚无东部地带迁入地户籍的所谓外来劳动力并未包括在内。根据 2000 年人口普查,在 1995~2000 年期间,迁入东部地带的省际迁移人口达 2596.5 万人,约占全国省际迁移人口的 76.4%;若剔除地带内迁移,则东部地带迁入人口为 2173.6 万人,占全国地带间省际迁移人口的 83.6%。而且相对中、西部地带,东部地带为唯一人口净迁入地带,净迁入人口达 1967.6 万人。如此大规模的迁入人口,对东部地带的社会发展不可能不产生重大影响。如考察对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影响,作为“消费者”,如此大规模的迁入人口将成为刺激东部地带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作为“生产者”,如此大规模的迁入人口更将成为缓解东部地带劳动力减少、特别是结构性不足矛盾,满足东部地带经济发展需求,推动东部地带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的重要贡献者。本文的目的,即主要从人口迁移和“生产者”角度,考察 1995~2000 年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对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作用及其贡献之大小。

2 人口迁移是推动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经济学理论和国内外的实践证明,人口迁移是合理配置生产要素、推动经济加快发展的重要“引擎”;在一定意义上,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历史,也就是人口迁移的历史(王桂新,2001)。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人口迁移,尽管尚处转轨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整体上对激发社会活力、加快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作用却已日益彰显。就东部地带而言,人口迁移同样也成为推动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2.1 人口迁移为东部地带提供了大量年富力强、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劳动力

首先,迁入人口年龄结构轻,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体。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在所有迁往东部地带的省际迁移人口中,仅 15~34 岁的青年人口即占八成以上(80.18%),其中尤以 20~24 岁年龄组所占比重最高,约占 26.53%,15~19 岁、25~29 岁、30~34 岁三个年龄组,也分别占 21.42%、20.07%和 12.17%。这一比例比东部地带本地同年年龄组人口竟高 46.5 个百分点(图 1)。若以劳动年龄人口计算,迁入东部地带的省际迁移人口中 15~64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则高达 92.98%。也就是说,迁入东部地带的省际迁移人口,基本是一支劳动力队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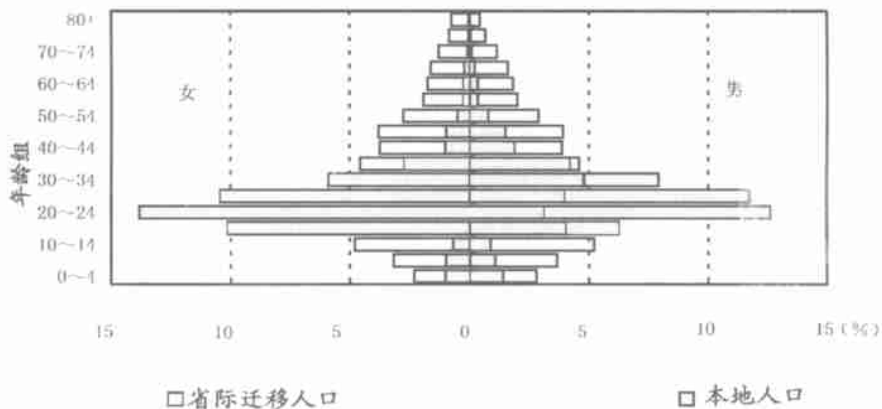


图 1 东部地带迁入人口和本地人口的年龄结构比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提供的 2000 年人口普查 0.95% 抽样资料。

其次,迁入人口受教育水平较高。根据 2000 年人口普查,迁入东部地带的省际迁移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8.86 年,比东部地带本地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长 1.39 年。在省际迁入人口中,以初中文化程度者比重最高,约占半数以上(56.08%),高于本地人口近 20 个百分点;其次是小学文化程度者,占 20.59%,比当地居民约低 15 个百分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也占有 20.94% 的较高比重,该比重亦明显高于本地人口的同一比重。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劳动力人口的大量入迁,提高了东部地带

整个常住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使东部地带常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7.48 年上升至 7.55 年。因此,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劳动力的大量入迁,及其所带来的东部地带常住人口劳动力素质的整体提高,对东部地带的经济发展必将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三,在迁往东部地带的省际迁移人口中,以经济原因迁入为主,显示了省际人口迁移与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根据 2000 年人口普查,以“务工经商”原因迁向东部地带的迁移人口约占 73.74%,加上“工作调动”、“分配录用”等其他经济原因,则因经济原因迁入东部地带的人口比重可高达 80.88%。这说明,迁入东部地带的约八成人口,将直接参与当地的经济活动,从而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事实上,在省际迁入人口中从业人员的比例高达 82.1%,比东部地带本地人口的就业比例(48.6%)高 33.5 个百分点,也说明了这一点。

2.2 迁入劳动力满足了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需求,促进了东部地带产业结构的调整

首先,迁入劳动力满足了东部地带经济迅速增长的需求。如前所述,在 1990 年代后期,东部地带本地劳动力出现减少变动,但其经济却呈迅速增长趋势。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带大量入迁的劳动力,虽然未被完全统计在从业人员中,但客观上却弥补了东部地带劳动力的不足,满足了东部地带经济迅速增长的需求。根据 2000 年人口普查,在 1995~2000 年期间,东部地带迁入人口中约有 2130.3 万劳动力在东部地带就业,其中从中、西部地带迁往东部地带就业的劳动力就达到 1818.7 万人。以广东省为例,1995~2000 年间迁入广东就业的外来劳动力约为 1100.6 万人,约为其 2000 年本地就业劳动力(3861 万人)的 28.5%。像深圳、东莞、中山等城市若干企业的生产,几乎都由外来劳动力支撑和完成。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外来劳动力入迁就业,不少企业就无法正常进行生产;正是大量的入迁劳动力,补充和满足了当地经济迅速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

其次,迁入劳动力缓解了东部地带城市地区劳动力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东部地带城市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及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以建筑业、制造业及家庭、餐饮服务业等“脏、累、险”工种为主的低层次劳动力市场。主要受传统观念及就业意识的影响,东部地带城市地区本地劳动力多不愿从事这些工种,因而使这些部门的劳动力就业出现短缺或不足现象。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制约及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城市迁入劳动力(外来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受到很大限制,绝大部分又只能参与到以上低层次劳动力市场就业,从事那些“脏、累、险”工种或工作,这样就很好地缓解甚至解决了东部地带城市劳动力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如以上海为例,根据 2000 年人口普查,上海迁入就业的外来劳动力中,从事“制造加工”、“建筑施工”及“运输设备操作”工种的约占 48.2%,从事“商业服务”、“餐饮服务”及“居民生活服务”工种的约占 27.4%,二者合计达 75.6%。另外,还有占 7.3%和 1.6%的外来劳动力从事“农林牧渔”及“废品回收”。这些外来劳动力,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甚至解决了上海相关部门劳动力需求结构性不足的矛盾,为上海城市建设及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三,迁入劳动力促进了东部地带产业结构的调整。从东部地带迁入就业的在业人口和本地在业人口的职业构成(表 1)看,和本地劳动力主要从事农林牧渔及水利生产的职业构成不同,迁入劳动力从事的职业主要集中在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等领域,约占其在业人口的 67.73%。另外,迁入劳动力中从事商业、服务业工种的比重也比本地劳动力高近 7 个百分点,几乎占全部就业劳动力的两成。而从事农林牧渔及水利生产工种的迁入劳动力比重,则明显低于本地劳动力。由图 2 亦可看出,与本地从业劳动力的行业结构比较,迁入在业劳动力中,第一产业比重仅占 5.8%,而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则高达 70.9%,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也高于本地劳动力。大量迁入劳动力的就业集中于第二、三产业,不仅为这些产业部门提供了大量劳动力,而且也有助于提高第二、三产业的比重,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及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另一方面,迁入劳动力在一些低层次行业、工种的就业,也

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本地劳动力,从而有助于本地劳动力向更高层次的行职业转移。

表 1 东部地带迁入在业人口和剔除迁移的本地在业人口的职业结构(%)

职业	迁入劳动力	不考虑迁移的本地在业人口
合计	100.00	100.00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1.10	2.30
专业技术人员	3.42	6.59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3.59	3.85
商业、服务业人员	18.15	11.17
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	5.96	55.41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67.73	20.64
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0.03	0.03

资料来源:同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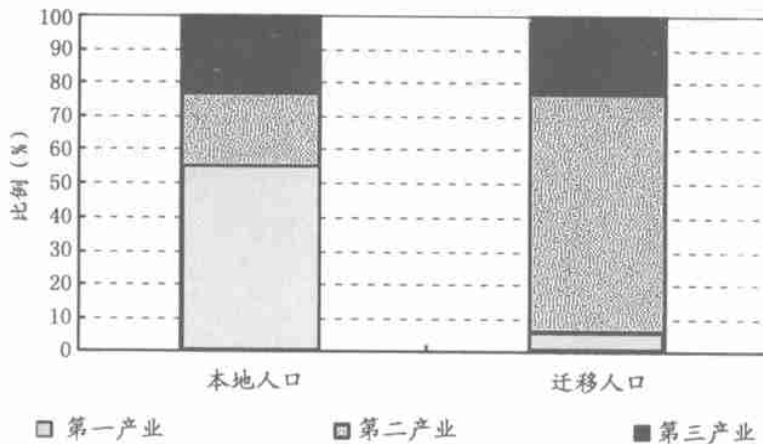


图 2 东部地带迁入在业人口和剔除迁移的本地在业人口的行业结构(%)

资料来源:同图 1。

3 人口迁移、劳动力与东部地带经济发展关系之分析

以上,仅从东部地带迁入劳动力的属性、规模、迁移原因、就业特征及东部地带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等方面,考察了省际人口迁移与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省际人口迁移已成为推动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以下再根据雇佣弹性及回归分析等方法,对人口迁移及劳动力与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以进一步揭示 1990 年代后期省际人口迁移、特别是迁入劳动力对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影响。

3.1 劳动投入与经济发展之分析

首先探讨东部地带就业劳动力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根据资料获得的可能性,现选用《上海统计年鉴》(下同)和《中国统计年鉴》1995~2000 年东部地带各省市的 GDP 和从业人口 L 两指标,并对二者做相关、回归分析,得以下模型:

$$Y = 852.575 + 1.446L \quad (\text{调整的 } R^2 = 0.754)$$

式中, Y 为国民生产总值 GDP(亿元), L 为从业劳动力(万人)。

根据以上相关、回归分析知,国民生产总值 GDP 与从业劳动力 L 的相关系数为 0.870,显示此间二

者之间存在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回归分析模型拟合效果较好,调整后的确定系数 $R^2 = 0.754$,显示模型中从业劳动力 L 对 GDP 也具有较强的说明力。也就是说,在此期间劳动力仍然是影响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根据上述模型可大致概算,从业劳动力每增加 1 万人, GDP 产出约增加 1.446 亿元。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以上模型分析中的从业劳动力主要为本地劳动力,但就其所反映的国民生产总值 GDP 与从业劳动力之间的密切关系而言,也间接说明了东部地带迁入劳动力与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而且由此亦可推知,对人口主要迁入地或作为唯一人口净迁入地的东部地带来说,省际人口迁移带来的大量入迁劳动力无疑对推动其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做一个简单推算,如前所述,在 1995~2000 年期间,东部地带净迁入人数约达 1967.6 万人。如果以边际劳动投入产出乘以净迁入人数,作为迁移人口对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则这一数值可达到 2845 亿元,可占 2000 年东部地带 GDP 总产出的 5% 左右。可见迁移人口对东部地带 GDP 增长的贡献还是很明显的。

当然,以上回归分析模型相对比较简单,忽略了其他一些重要变量,但它仍然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省际人口迁移带来的大量入迁劳动力对推动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3.2 雇用弹性分析

雇用(或就业)弹性是从业人员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GDP 增长率)之比,也可以解释为经济增长的劳动需求诱发效果。一般地说,如果雇用弹性系数为正,说明经济增长需要增加劳动力的投入,或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雇用弹性系数越大,说明同样的经济增长诱发的劳动力需求越多,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投入依赖越大。反之,如果雇用弹性系数为负,说明就业劳动力的增加将减缓经济增长,即就业劳动力增加不利于经济增长;雇用弹性系数为负且绝对值越大,说明增加劳动力投入越多,对经济增长越不利。雇用弹性系数为 0,说明经济增长与就业劳动力的增减无关。

为了正确地计算雇用弹性系数,更好地反映东部地带劳动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本文计算东部地带各省市雇用弹性系数的劳动力,采用其本地劳动力与从其他省市迁入的外来劳动力之和,即各省市参与经济活动的常住人口劳动力总数;经济指标采用各省市 GDP 增长率。根据 2000 年人口普查 0.95% 抽样资料(用于计算省际净迁入劳动力)及《中国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所得的 1995~2000 年间东部地带各省市的雇用弹性系数如表 2 所示。由此可以看出:

表 2 东部地带各省市 1995~2000 年间的雇用弹性系数

地区	雇用弹性系数
东部合计	0.094
北京	0.153
天津	-0.154
河北	0.027
辽宁	-0.138
上海	0.273
江苏	-0.050
浙江	0.093
福建	0.141
山东	0.018
广东	0.440
海南	0.046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1995~2000 各年版有关数据计算。

第一,在 1995~2000 年间,整个东部地带雇用弹性系数为 0.094。该系数大于 0,说明东部地带的经济增长需要增加劳动力投入。或换言之,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可以促进东部地带的经济增长;但该雇用弹性系数又不大,说明东部地带的经济发展,受劳动力投入增加因素的影响不是很大,劳动力已不是决定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受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高及体制改革或制度创新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将更大一些。

第二,天津、辽宁、江苏三省市的雇用弹性系数为负值,说明仅从现有数据分析,这些省市就业劳动力的增加与其 GDP 增长的关系并不明显甚至表现为负向关系。由于这里计算雇用弹性系数的从业人口增长率包括了净迁入从业人口和本地从业人口增长,因而仅根据这一负弹性系数还无法得知其迁移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但是,因为天津、辽宁、江苏三省市的本地从业人口增长都为负值,而其净迁入从业人口为正,也就是说在其常住人口劳动力中迁移从业人口比重有所增加,这或许也能间接反映相对于本地劳动力,迁入劳动力对其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有所增大的。当然,这三省市的雇用弹

性系数是否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还有待做进一步探讨。

第三,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广东和上海的雇佣弹性系数都比较高,其中广东省高达 0.440,几乎为东部地带平均水平的 5 倍;上海的雇佣弹性系数也达到 0.273 的较高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经济迅速发展,省际迁入人口大量增加。特别在 1990 年代后期,集中迁入到广东省的省际迁移劳动力,已约占迁入东部地带省际迁移从业劳动力的 60%,达其本地从业劳动力的 28.5%。已如前述,特别像深圳、东莞、中山等城市若干企业的生产,已几乎都由外来劳动力支撑和完成。同样,作为全国最大经济中心的上海市,进入 1990 年代以来,城市建设及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年年变样,也吸纳了大量省际迁移劳动力,规模仅次于广东,在本市常住人口劳动力中亦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些均显示广东、上海两省市的经济发展与劳动力增加,特别是省际迁入人口、劳动力的迅速增加具有密切关系。可以说,广东、上海两省市,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与省际迁入人口规模基本是同步发展的,正如其较大的雇佣弹性系数所显示的意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诱发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省际人口迁移所带来的大规模入迁劳动力,正满足了两省市经济迅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入迁外来劳动力已成为两省市就业劳动力队伍的重要方面军,对推动两省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一定意义上,广东、上海两省市经济发展与劳动力增加的关系,应该更符合、更真实地反映和代表了东部地带经济发展与省际人口迁移特别是由此所带来的外来劳动力增加密切相关的实际状况。以下分析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4 人口迁移对东部地带经济发展贡献之测算

以上考察分析说明,在 1990 年代后期,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已成为推动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大量入迁劳动力不仅满足了东部地带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缓解了东部地带劳动力就业结构性不足的矛盾,促进了东部地带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且作为东部地带从业劳动力队伍的一个重要方面军,正在继续为推动东部地带的经济发展发挥作用,做出贡献。当然,东部地带各省市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一点,从以上雇佣弹性系数的计算分析结果已得以说明。为了正确把握和评价省际人口迁移对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作用,以下再主要从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出发,进一步测算 1990 年代后期省际迁移人口对推动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贡献及其大小。

如前所述,经济增长要受若干因素的影响,从生产要素角度考察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有多种方法。本文考察 1990 年代后期省际迁移人口对推动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贡献及其大小,主要采用以下要素分解法(王桂新、殷永元,2000)。在测算时,经济指标以 GDP 表示,劳动力指标以从业劳动力表示,具体包括本地劳动力和省际人口迁移而带来的入迁外来劳动力(净迁移)两部分。

4.1 几个基本假定

考虑数据的局限和便于分析,本文拟作以下假定:

第一,所有劳动力等质(即不考虑劳动力的素质差异)。基于此,将影响东部地带及各省市经济增长的因素,两分为包括数量规模和就业结构的从业劳动力因素和除此从业劳动力以外其他所有因素。在该假定下,本文将主要由从业劳动力数量规模和就业结构角度分析劳动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大小。

第二,受数据制约,由于未能得到期初年份 1995 年各省市分产业的 GDP 数据(上海除外),故假定各省市分产业的 GDP 在 1994~1996 年间均匀增长,从而用简单算术平均法求得 1995 年各省市分产业的 GDP 比重。

第三,为考察省际迁移劳动力在迁移前后就业结构及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假定 1995~2000 年间迁

如 1990 年代后期以来,不少地区的从业人员数因企业转制(如国有企业民营化)及相关统计口径的变化而有所减少,实际从业人数则未必真正减少。天津、辽宁、江苏三省市雇佣弹性系数为负值以及东部地带雇佣弹性系数总体不高或许亦与这一因素有关。

出人口的从业人员比重(从业人数/总人数)以及在各产业的分布比例和1995年相同。

4.2 方法和步骤—以上海为例

以下将分别从劳动力数量增加和就业结构变动两方面,测算劳动力要素对推动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贡献及其大小。

(1) 劳动力数量增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及其大小

首先,假定1995~2000年间劳动力就业结构不变,并在该假定条件下推算2000年第一、二、三产业的常住人口劳动力和本地(户籍)劳动力(二者均指从业劳动力,下同)。已知上海1995年第一、二、三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分别为0.0985、0.5447、0.3568,2000年常住人口劳动力(包括净迁入)及本地劳动力分别为978.17万人和828.35万人。则按1995年就业结构,可求得2000年常住人口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第一、二、三产业从业人数分别为96.35万人、532.81万人、349.01万人和81.59万人、451.20万人、295.56万人。

其次,在假定1995~2000年间劳动生产率不变前提下,推算2000年GDP产出。根据统计资料按当年价格计算,1995年各产业劳均GDP分别为7882.43元、32592.41元、34973.36元。将该劳均GDP与以上推算的没有发生就业结构变动的第一、二、三产业劳动力数量相乘,可得到2000年常住人口劳动力(包括净迁入)和本地劳动力在劳动生产率不变条件下第一、二、三产业的GDP产出分别为75.95亿元、1736.55亿元、1220.61亿元和64.31亿元、1470.58亿元、1033.66亿元。由此可求得2000年常住人口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在劳动生产率不变条件下创造的三产业GDP总产出分别为3033.11亿元和2568.55亿元。

第三,在以上基础上,计算仅由劳动力数量增加对GDP增长的率贡献和贡献度。据统计,1995年上海三产业GDP总产出为2462.57亿元,1995~2000年GDP增长率为84.81%,则1995~2000年间仅由劳动力数量增加对GDP增长的率贡献和贡献度分别为:

常住人口劳动力数量增加对GDP增长的率贡献和贡献度为

$$\text{率贡献} = \frac{(3033.11 - 2462.57)}{2462.57} = 23.17\%$$

$$\text{贡献度} = \frac{23.17\%}{84.813\%} = 27.32\%$$

本地劳动力数量增加对GDP增长的率贡献 = $\frac{(2568.55 - 2462.57)}{2462.57} = 4.30\%$

由此可求得外来劳动力数量增加对GDP增长的率贡献为 $23.17\% - 4.30\% = 18.87\%$,对GDP增长的贡献度为 $\frac{18.87\%}{84.813\%} = 22.25\%$ 。

(2) 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及其大小

假定1995~2000年间劳动力数量不变,即期末2000年和1995年相同。由于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不同,所以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发生就业结构的转移变动也会带来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GDP的增长。已知上海2000年各产业常住人口劳动力分别为100.27万人、442.62万人和435.27万人,本地劳动力分别为89.23万人、367.04万人和372.08万人,则根据1995年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劳均GDP),可求得2000年第一、二、三产业常住人口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的GDP产出分别为79.04亿元、1442.61亿元、1522.29亿元和70.33亿元、1196.27亿元、1301.29亿元,即2000年常住人口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在数量不变条件下、仅由于就业结构变动而创造的三产业GDP总产出分别为3043.94亿元和2567.89亿元。

根据以上,即可计算1995~2000年间仅由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对推动GDP增长的率贡献和贡献度分别为:

常住人口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对GDP增长的率贡献和贡献度为

$$\text{率贡献} = \frac{3043.94 - 3033.11}{2462.57} = 0.44\%$$

$$\text{贡献度} = \frac{0.44\%}{84.813\%} = 0.52\%$$

本地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对推动 GDP 增长的率贡献和贡献度为

$$\text{率贡献} = \frac{(2567.87 - 2568.55)}{2462.57} = -0.027\%$$

$$\text{贡献度} = \frac{-0.027\%}{84813\%} = -0.032\%$$

由此可求得外来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对推动 GDP 增长的率贡献为 $0.44\% - (-0.027\%) = 0.467\%$, 对 GDP 增长的贡献度为 0.551% 。

4.3 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方法和步骤,可求得 1995~2000 年间东部地带各省市常住人口劳动力及其本地和外来劳动力对 GDP 增长的贡献(表 3、表 4)。由此可以看出:

表 3 东部地带劳动力数量变动对推动 GDP 增长的贡献(%)

	常住人口劳动力		本地劳动力		外来劳动力	
	率贡献	贡献度	率贡献	贡献度	率贡献	贡献度
东部合计	2.22	3.00	- 4.87	- 6.59	7.09	9.59
北京	11.88	15.29	- 7.05	- 9.07	18.93	24.36
天津	- 12.00	- 15.35	- 16.93	- 21.66	4.93	6.31
河北	2.14	2.73	2.20	2.80	- 0.06	- 0.07
辽宁	- 9.27	- 13.81	- 10.88	- 16.20	1.60	2.39
上海	23.17	27.32	4.30	5.07	18.87	22.25
江苏	- 3.35	- 5.04	- 5.49	- 8.26	2.14	3.22
浙江	6.62	9.29	- 0.02	- 0.03	6.64	9.31
福建	11.45	14.06	5.95	7.31	5.50	6.75
山东	1.25	1.76	0.78	1.10	0.47	0.66
广东	34.96	43.95	5.59	7.02	29.37	36.93
海南	1.96	4.63	- 0.42	- 0.99	2.38	5.61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统计年鉴》及《中国统计年鉴》1995~2000 各年版、2000 年人口普查 0.95% 抽样资料计算。

表 4 东部地带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对 GDP 增长的贡献(%)

	常住人口劳动力		本地劳动力		外来劳动力	
	率贡献	贡献度	率贡献	贡献度	率贡献	贡献度
东部合计	2.98	4.03	- 0.78	- 1.06	3.76	5.09
北京	- 0.46	- 0.59	- 1.12	- 1.44	0.66	0.85
天津	- 1.44	- 1.85	- 1.81	- 2.32	0.37	0.47
河北	2.88	3.67	2.30	2.93	0.59	0.74
辽宁	- 5.52	- 8.23	- 5.76	- 8.57	0.23	0.35
上海	0.44	0.52	- 0.027	- 0.032	0.47	0.55
江苏	- 0.41	- 0.62	- 1.56	- 2.35	1.15	1.73
浙江	9.13	12.82	4.01	5.63	5.12	7.19
福建	8.81	10.81	3.88	4.77	4.93	6.05
山东	1.81	2.56	1.03	1.46	0.77	1.09
广东	14.20	17.86	- 4.24	- 5.33	18.44	23.18
海南	0.57	1.35	- 1.42	- 3.36	2.00	4.71

资料来源:同表 3。

第一,在 1995~2000 年间,东部地带国民生产总值 GDP 增长了 73.98%,而仅考虑数量增加和就业结构变动的劳动力要素,使 GDP 增长了 5.20%(率贡献),约占全部影响要素总贡献的 7.03%(贡献度)。尽管这里可能由于没有考虑劳动力素质等人力资本因素而低估了劳动力要素对 GDP 增长的影响,但总的来看相对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带,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仍然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已不是影响其 GDP 增长的关键要素。而在其仅考虑数量增加和就业结构变动的劳动力要素对推动东部地带经济增长的贡献中,从业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对 GDP 增长的贡献较大(率贡献和贡献度分别为 2.98%和 4.03%),数量增加变动对 GDP 增长的贡献较小(率贡献和贡献度分别为 2.22%和 3.00%),二者对推动东部地带经济增长的贡献大致成“六、四开”(57.33%和 42.67%)。

第二,从整个东部地带来看,由于本地劳动力无论数量变动还是就业结构变动都已不利于东部地带的经济增长(均为负贡献),尤以数量变动(减少)对东部地带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最明显(约使 GDP 减少 4.87%),所以上述劳动力要素对推动东部地带经济增长的贡献,几乎都是由外来劳动力完成的。也就是说,仅就劳动力要素而言,外来劳动力已成为推动东部地带经济增长的唯一贡献者。如果包括抵消本地劳动力负向影响的部分,省际人口迁移带来的大量入迁外来劳动力,可使东部地带 GDP 增长 10.85%(率贡献),对 GDP 增长的贡献度为 14.67%。即 1990 年代后期外来劳动力推动东部地带 GDP 增长了 10%以上,贡献了东部地带 GDP 增长的近 15%。这一数据,清楚地说明了省际人口迁移对推动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第三,外来劳动力对东部地带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是由其数量增长贡献的。由表 3、表 4 可以看出,在 1995~2000 年间,外来劳动力数量增加和就业结构变动可分别使东部地带的 GDP 增长 7.09%和 3.76%,对 GDP 增长的贡献度分别为 9.59%和 5.09%,二者之比均大致为 65:35。这主要是因为,外来劳动力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东部地带城市地区,在城市地区又主要是从事一些虽然不可缺少,但多为“脏、累、险”且收入水平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工种,所以外来劳动力对东部地带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和贡献,主要是通过以庞大的“人海战术”实现的;而通过就业结构变动、促进东部地带产业结构调整进而推动其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对较小。

第四,各省市外来劳动力对本地经济发展的作用表现出一定的共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省际人口迁移(外来劳动力)推动了东部地带各省市的经济发展。虽然河北省外来劳动力在数量上不利于其经济发展(人口净迁出),但其迁入劳动力对本地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性作用,仍然使省际人口迁移对河北省的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正向推动作用;二是除河北、山东两省以外,其他各省市的外来劳动力都是以数量增加对本地经济增长的作用及贡献较大,而就业结构变动的作用和贡献较小。这些共性特征,决定了省际人口迁移对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以及外来劳动力主要是以“人海战术”对东部地带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

第五,各省市外来劳动力对本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及其大小亦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根据外来劳动力对本地经济增长的作用及贡献大小,可将东部地带大致划分为三类地区:第一类是北京、上海、广东三省市,其外来劳动力对本地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在 20%以上(上海最低亦为 22.8%),尤以广东外来劳动力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贡献度高达 60%;第二类是天津、浙江、福建、海南四省市,其外来劳动力对本地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都比较大。天津相对最小,约为 6.78%,浙江最大,外来劳动力对本地经济增长的贡献为 16.50%,福建、海南两省居二者之间;河北、辽宁、江苏、山东四省为第三类地区,外来劳动力对本地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在 5%以下。已有研究指出,北京、上海、广东都是中国 1990 年代后期省际人口迁移的强势吸引中心,而天津、浙江、福建则为同期省际人口迁移的次级吸引中心(王桂新、刘建波,2003)。可见外来劳动力对推动本地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与是否为省际人口迁移重要吸引中心有密切关系。

5 结束语

本文主要从考察迁入东部地带的省际迁移人口的属性、规模、迁移原因、就业特征等入手,对1990年代后期省际人口迁移、劳动力与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省际迁移人口(外来劳动力)对推动东部地带经济增长的作用及贡献大小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虽然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高及体制改革或制度创新等因素,已开始对东部地带的经济增长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即使对中国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带来说,劳动力要素仍然是其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重要因素。在此期间,省际人口迁移带来的大量外来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几乎推动东部地带的GDP增长了10%以上,贡献了东部地带GDP增长近15%,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地带大部分省市本地劳动力的供给已不能适应当地的经济的发展,甚至已对当地的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消极影响。毫无疑问,无论何时劳动力都是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之一。但在1990年代后期,东部地带为什么出现本地劳动力供给不适应当地经济甚至产生消极影响,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主要受其影响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导致劳动力减少而供给不足,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事关东部地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研究表明,省际人口迁移已成为推动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正是大量外来劳动力的迁入,弥补了东部地带本地劳动力供给的不足,在东部地带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中外来劳动力又主要是以增加数量的“人海战术”对东部地带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而且,越是省际人口迁移吸引中心,净迁入人口规模越大,迁入的外来劳动力对推动迁入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和贡献就越大(二者相关系数为0.923),显示了省际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因此,在目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如何进一步刺激和活跃省际人口迁移,扩大省际人口迁移规模,推动东部地带以及全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又一重大问题。

参考文献:

- 1 王桂新. 人口迁移,将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引擎”. 人口研究, 2000;1
- 2 王桂新,殷永元. 上海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上海财大出版社, 2000
- 3 王桂新,刘建波. 1990年代后期我国省际人口迁移区域模式研究. 市场与人口与分析, 2003;4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China : 1995 - 2000

Abstract :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 - provincial mi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China over 1995 - 2000 , having noted that inter - provincial migration (non-native labour force) has become a crucial factor driv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China. The massive labourers coming from other parts of China , by filling the gap in supply of the local labourers , contributed to GDP growth by 10 % , or 15 % of GDP increment in East China over 1995 - 2000. In East China , centers attracting more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have greater shar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non-native labourers.

Keywords : East China ,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 Economic Development .

Authors : Wang Guixin is professor , Population Institute of Fudan University ; Huang Yingjue is master candidate in economics , Fudan University .

(责任编辑:陈卫 收稿时间:2004 - 11)